

从越南语汉源词汇看汉语南方方言对越南语的影响

咸蔓雪

摘要：越南语中存在大量的汉源词汇。此前研究已确定越南语汉越音主要来源于中唐至晚唐汉语，但汉越音的空间来源问题仍可进一步讨论。本文从语音、词汇和语法层面考察越南语汉源词汇中汉语南方方言的影响。通过把汉越音系与汉语粤方言在音韵上的共享创新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可见汉越音与粤语西部方言有着密切关系。词汇方面，在汉越音语素之外，非汉越音的汉源词汇中有不少源自汉语南方方言。此外，越南语汉源词汇在语法上也呈现出与汉语南方方言相近的特征。越南语汉源词汇所体现的汉语南方方言特征与不同历史时期华人南迁的史料记载相印证，语言接触的结果反映了族群迁徙和不同语言社团、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关键词：越南语 汉源词汇 粤方言 语言接触

越南语中存在大量的汉源词汇，以汉越音为基础的汉越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除此之外还存在大量非汉越音汉源词。汉越音以及越南语中汉源词汇的时空来源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进行历史层次分析，已确定了3938个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其中汉越音语素2926个，非汉越音语素1012个，并按照借入年代，即语言接触发生的时间点，把这些关系语素归入上古、中古前期、中古后期和近代以后^①四个层次，分别对应秦汉时期、东汉末年至隋唐

① 本文讨论汉越古代语言接触问题，对于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中“近代以后”的时间层次，是结合汉语史所做的划分。汉语学界对近代汉语的时间上限问题观点不一，本文结合汉语史和汉越语言接触历史，“近代以后”指的是宋代及以后的时期。

前期、中唐至五代、宋代及以后这四个历史时期。其中，汉越音语素分布在中古后期的有2623个语素，占汉越语关系语素的近90%，显示汉越音主要来源于中唐汉语。^①除了汉越音关系语素之外，非汉越音关系语素主要分布在上古和中古前期层次，其中上古层次349个，中古前期516个，中古后期113个，近代以后34个。其在上古（秦汉时期）和中古前期（东汉末年至隋唐前期）两个时间层次分布较多，与古代越南^②与中国在历史上发生文化接触的时期相符，显示随着秦汉经略岭南交趾以及东汉末年之后中原土人南下，汉语与古代越南语（或越南语的早期祖语）就已发生接触，有成批的汉语词汇被借入越南语中。由此，汉越音系开始形成的时间以及越南语中汉源词汇的借入年代问题可以说已基本厘清，汉越音系主要来源于中古汉语，具体而言是中唐至晚唐的汉语。

但是，汉越音来源于汉语何种方言，尚可进一步讨论。马伯乐在其1920年的《唐代长安方言考》中提出汉越音（“越南译音”）的基础是长安话^③，但近年来国内有学者注意到岭南汉语方言对汉越音的影响，如韦树关认为汉越音是在古代岭南地区的权威方言“广信方言”的影响下形成的^④。我们从最直观的观察，汉越音与中古汉语音系存在整齐的对应，而汉语一些南方方言，如粤方言也保留了一些存古特征，如保留了-m韵尾以及-p、-t、-k等入声字韵尾，由此汉越音音系也呈现出与粤方言相似的语音格局。此外，在词汇上，除了汉越词，还存在一些明显与汉语南方方言相关的非汉越音词汇，例如：tháy（看见，对应汉字“睇”），tiêm（店铺），xíu（小，少，对应汉字“少”），sòng（赌场，对应汉字“场”），tài xiú（押宝，赌大小），xíu mại（烧麦），等等。

① 参见咸蔓雪《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历史层次分析》，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310、324页。

② 本文所说“古代越南”是一个地域概念，而非国家或政权名称。本文使用这一概念指的是今越南国家疆域在古代所覆盖的地域范围，这一地理范围在不同历史时期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或不同的政权，本文统称为“古代越南”。

③ [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聂鸿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页。

④ 韦树关：《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196页。

由此，我们不难产生一个假设：与古代越南语发生接触的应为古代岭南地区的方言，而非通语，进而产生推测：汉越音是否就来源于某个汉语南方方言，或具体而言就是粤方言？

本文拟对越南语中汉源词汇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呈现的与汉语南方方言相关的特点进行考察，确定汉越音和越南语汉源词汇的空间来源，通过语言接触研究探寻古代汉越民族之间交流的痕迹。

一、有关汉越音方言来源的主要观点

马伯乐在《唐代长安方言考》中提出：“越南译音（sino-annamite）是唐代末年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然而它是什么地方使用的呢？越南译音对鼻声母的处理情况表明其基础不是长安方言，用 η ^①来译日母似乎显示出它更接近吴方言，可是其元音格局则彻底排除了吴方言的可能性：它从来不混淆二等字和四等字。我认为不应该把越南译音看作是一种特殊方言的反映。我们谈论的这个方言不会是北部湾的中国人所说的话，而是在唐代末年交州学校里教授的那种与之截然不同的方言。抛开其中极为特殊的现象不论，唐代这种古语言的基础肯定是北方话，尤其是长安话。”^②

马伯乐提出这一论断，可能是因为汉越音涵盖了多个汉语方言的特征，所以不是“一种特殊方言的反映”，而是来自于通语，而汉越音中体现的其他方言的“极为特殊的现象”可以抛开不论。但是，我们无法想象，在公元7—8世纪幅员辽阔的中国，交通和人员往来、文化交流远不如现代方便的情况下，交州（安南）地区的士子和民众如何学到标准的长安话。当时固然已经有《切韵》等韵书流传，或者民

① 中古汉语音系中，以《切韵》三十六个汉字作为声母的分类，日母是其中的一个声母。在汉越音中，日母字主要对应为 ηh （国际音标为 $[ɲ]$ ，马伯乐记为 η ），如：日 $\eta h\hat{a}t$ ，儒 $\eta h\hat{o}$ ，然 $\eta h\hat{i}e\tilde{n}$ ，热 $\eta h\hat{i}e\tilde{t}$ ，等等。

② 〔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聂鸿音译，第13页。

间还有其他诗韵手册，便于偏远地区的文人士子学习诗词格律或应对科举。但在人员流动并不发达的古代，不同地域学习通语的成效不容乐观。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期间（815—819年）写下了“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的诗句（柳宗元《柳州峒氓》）^①。柳宗元祖籍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永济一带），出生于长安，到了岭南不得不发出“异服殊音不可亲”的感叹，可见当时岭南地区方言与中原通语之间差异巨大。我们在史料中也几乎没有看到当时的岭南和安南地区有官方教习正音的机构存在^②，在古代并没有“推广普通话”的官方行为的背景下，偏远地区习读官方正音的难度可想而知。因此，唐代末年交州（安南）学校里能否教授真正的长安话，我们是不得而知的。

事实上，马伯乐认为汉越音来自于古代长安方言也有犹豫。他从日母字对应 η 判断汉越音的基础不是长安方言，又从元音格局判断其来源不是吴方言，也就是说，他是以某一条语音特征的比较就否定了汉越音的某些方言来源，从而作出了汉越音反映的是当时的通语，即长安话的判断。我们认为，仅凭一两条语音特征就作出的结论并不妥当。要考察某一语言或方言的来源，应该与相关亲属语言或方言进行较为全面的语音特征比对。目前有关唐代西北方言的研究成果已经相对系统，我们从罗常培先生的《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可以一窥唐

① 尚永亮：《柳宗元诗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284页。

② 史料中可见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岭南和安南开办学校、发展教育的记载。《隋书·令狐熙传》记载：“上以岭南夷、越数为反乱，（开皇十七年）征拜（令狐熙）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熙至部……开设学校，华夷感敬，称为大化。”《唐会要·南选》：“天宝十七载七月敕：如闻岭南州县，近来颇习文儒。自今已后，其岭南五府管内白身有词藻可称者，每至选补时，任令应诸色乡贡，仍委选补使准其考试。……有词理兼通、才堪理务者，亦任北选，可授北官。”《新唐书·马总传》：“元和中，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唐摭言》卷一，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记载：“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这些记载可见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安南地区开办官学、发展教育、实施科举制度、以儒家思想教化民众的举措。但官学中使用何种方言，是否教习官话，如何教习诗韵等等，笔者在常用典籍中还未看到记载。

末西北方音（其中也包括长安话）的语音特征。其中比较明显的特征包括：古全浊声母（並奉定澄从崇群）读送气音；微母单立；上古歌部读a；支微入鱼；麻韵开口三等主要元音为a；等等。^①我们把汉越音系与之进行简单比较，虽然有个别特征相近（如微母读为v），但大多数特征并不相符。因此，我们认为汉越音并非来源于唐末长安音。

近年来，李连进、韦树关、蓝庆元等学者也对汉越音与汉语南方方言或周边民族语言中的汉字音进行了对比，认为汉越音与古代南方方言关系密切。李连进在《平话音韵研究》中把汉越音和玉林话（桂南平话的代表性方言之一）进行了比较。他的主要目的是判断平话与粤方言的关系，因此选取了平话与粤方言相关的11项语音特征，与存古度较高的汉越音进行对比，对比结果显示，玉林音与汉越音相合关系项有8项，相斥关系项为3项，二者有着很高的相似度。^②韦树关把汉越音与粤方言勾漏片、闽方言海南片、平话方言桂南片等方言以及华南壮侗语族和瑶语的汉借词语音特征进行了比较，提出今广西和广东交界地区，古代曾经有过一个“权威性的汉语方言”——广信方言。“汉越音”并不是越南脱离中国封建统治而独立建国后越南语自主发展形成的一套汉字读音系统，而是古代越南语在汉语“广信方言”的影响下形成的。^③蓝庆元将汉越语与壮语汉借词进行音韵特征对比之后提出：“汉越语与壮语中的汉语借词有非常相似的形式。通过比较我们会发现，壮语后中古层次与平话的渊源虽然比较深，但不等于它就是从平话借入。在中古的西南地区曾经流行着内部比较一致的汉语方言，它可能是壮语后中古层次、平话、汉越语的共同祖先。这种方言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且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它也受到中原方言的

①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 李连进：《平话音韵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19页。

③ 韦树关：《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第196页。

影响，这可以解释壮语后中古层次与汉越语、平话不一致的地方。”^①

我们认为，要想厘清汉越音的古代汉语方言来源，需要把汉越语关系语素不同层次的语音特征与可能有关系的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中的汉字音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才能得出更准确的判断。根据已有研究，我们已基本确定汉越音的来源并非古代长安方音，从语言接触的一般规律以及现代京语与汉语接触的情况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在唐朝时期与古代越南语（或越南语的早期祖语）发生接触的汉语方言，更有可能是与越南邻近的汉语南方方言。因此，我们主要考察岭南地区的分布较广的汉语粤方言。粤方言内部的次方言分区问题比较复杂，我们参考粤方言的研究成果，把汉越音与粤方言广府片、勾漏片和钦廉片几个次方言进行对比，以观察汉越音与邻近汉语方言的相似特征。此外，此前研究显示，汉越音与平话^②存在一定的语音相似性，因此我们把平话也纳入比较范围。汉越音可视为汉语的一种域外方音，我们用汉语方言，尤其是相邻的南方方言与其进行音韵特征的比较，考察其空间来源，应该是可行的。

二、越南语汉源词汇与粤方言和平话的语音特点对比

如前所述，汉越音系与粤方言在语音上呈现出一定的关联特征，但这种相关性是因为汉越音是受粤方言影响而形成，还是因为汉越音和粤方言都是从同一个汉语方言（或通语）分化发展而来，仅凭表面上的相似性并不足以得出结论。如果以中古汉语音系为参照，汉越音与现

① 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91页。

② 关于平话是否属于粤方言的问题，汉语学界有诸多讨论，如李连进《平话是独立方言还是属于粤方言》（1999年）、詹伯慧《关于广西“平话”的归属问题》（2003年）、李小凡《平话的归属和汉语方言分类》（2012年）、侯兴泉《粤语勾漏片封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2016年）等。本文旨在分析汉越音系与汉语南方方言（主要是岭南地区汉语方言）的关联，不讨论平话在中国方言分区中的归属问题。由于此前已有学者将汉越音与平话做过对比研究，故此本文也把平话作为单独的对比如项，并按原文引述其他学者的观点。

代汉语方言今天的面貌，都是经历了上千年发展的结果，汉越音与粤方言的语音相似性，更多的是保留了相同的中古汉语特征，如保留入声韵尾等。麦耘指出：“唐宋之间，南汉（917—971）在岭南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内部稳定、与北方几乎隔绝的时期，通语对岭南汉语的影响也大大减少。这造就了适合粤方言诞生的社会环境。这是粤方言保留汉语中古后期通语音系很多特点的原因。此后，粤方言的音韵创新很少。今天粤方言与古代通语的直接继承者北方官话方言的类型差距如此之大，主要是后者在晚唐以后的大量创新造成的……换言之，在粤方言这方面说，它区别于官话的基本上是存古特征。”^①汉越音也有与粤方言相似的存古特征。因此，我们在分析汉越音与相关汉语方言的语音关联时，一方面，是以中古汉语为出发点，考察汉越音及相关汉语方言与中古汉语共有的语音特征，如保留入声韵尾、声母清浊格局等；但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关注其创新特征，即从中古汉语出发再进一步向前演变而产生的新特征。我们把汉越音视为汉语的一种域外方音，虽然这种方音在域外的环境下与另一个民族语言发生了接触，其经历的演变过程不同于域内的汉语方言，但我们依据其音系特点，依旧能看出所借入的源方言的一些语音特征，由此可以与相关方言进行比对。

汉越音的创新特征，即汉越音不同于中古汉语音系的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1. 声母：中古汉语还保持着清浊分立，而汉越音清浊合流，其中全浊塞音字读不送气，音並母读b[b]，定母读d[d]，群母读c/k/q[k]，如：盘bàn，平bình，步bộ，大đại，谈đàm，桃đào，导đạo，徒đồ，度độ，球cầu，其kỳ，共cộng，桥kiều，轿kiệu，群quần，穷cùng，权quyền，卷quyển，等等；

帮组重组四等字声母发生舌齿化，即唇音字读入t[t]、th[t^h]、d[z]

① 麦耘：《粤方言的音韵特征——兼谈方言区分的一些问题》，《方言》2011年第4期，第295页。

声母，如：宾 tân，卑 ti，必 tát，币 tậ，便 tiện，篇 thiên，譬 thí，民 dân，面 diện，妙 diệu，等等；

见组开口二等字腭化，即声母由舌根音变为舌尖音 gi[z]、x[s] 或舌面音 nh[p]，如：家 gia，假 giả，价 giá，阶 giai，解 giải，交 giao，教 giáo，间 gian，简 giản，减 giảm，江 giang，讲 giảng，甲 giáp，巧 xảo，壳 xác，确 xác，雅 nhã，涯 nhai，颜 nhan，乐 nhạc，等等。

其他的还有庄组章组分立、知组庄组合流、精从邪合流、章船禅合流等特征。

2. 韵母：中古汉语果摄（歌戈韵）和假摄（麻韵）分立，而汉越音合流，主要元音对应为 a[a]。果摄字如：个 cá，多 đa，朵 đoá，河 hà，火 hoả，可 khả，娥 nga，破 phá，果 quả，妥 thoả……假摄字如：霸 bá，野 dã，者 giả，假 giả，下 hạ，花 hoa，寡 quả，斜 tà，查 tra，奢 xa，社 xã，等等；

汉越音宕摄三等字以庄组声母为分化条件：主体对应为 ương[uaŋ] 韵，庄组声母字对应为 ang[aŋ] 韵。如：章 chương，障 chương，强 cường，洋 dương，养 dưỡng，香 hương，良 lương，让 nhượng，上 thượng，长 trường，央 ương，略 lược，却 khước，约 ước……为非庄组字；床 sàng，爽 sáng，创 sáng，庄 trang，状 trạng……为庄组字。

韵母其他特征还包括：鱼韵庄组单立，止摄内部支脂微三韵合流但精组声母单立，江韵庄组单立，蟹效咸山几个四等齐全的韵摄中一二等韵、三四等韵分别合流，梗摄读入腭化韵母，等等。

3. 声调：相较于中古汉语声调系统而言，汉越音声调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次浊平声字读入阴平调（越南语横声），而非阳平调。如：民 dân，名 danh，移 di，游 du，阳 dương，来 lai，林 lâm，劳 lao，连 liên，留 lưu，毛 mao，明 minh，门 môn，银 ngân，宜 nghi，严 nghiêm，吴 ngô，人 nhân，云 vân，文 văn，荣 vinh，无 vô，等等。

我们总结了汉越音在声母、韵母、声调上的音韵特征，与粤方言和平话进行对比如下：

表1 汉越音韵特征与粤方言和平话对比一览表^a

音韵特征	汉越音	广府片 粤方言	勾漏片 粤方言	钦廉片 粤方言	桂南 平话
1.清浊合流，古全浊塞音声母今不送气	+	-	+	-	+
2.帮组重四舌齿化	+	-	-	-	-
3.微母读v	+	-	-	-	-
4.庄章分立	+	-	-	-	-
5.知庄合流	+	+	+	+	+
6.精从邪合流，章船禅合流	+	+	+	+	+
7.见组开口二等腭化（梗摄除外）， 疑母二等与日母合流	+	-	-	-	*
8.喻三（云母）喻四（以母）分立	+	-	-	-	-
9.果假摄合流	+	-	-	-	+
10.鱼韵庄组单立	+	+	+	+	+
11.蟹效咸山四摄开口字，一二等、 三四等合流	+	+	+	-	+
12.止摄内部合流，其中精组单立	+	-	+	-	-
13.梗摄入腭化韵	+	-	-	-	*
14.宕摄三等和江摄庄组单立	+	+	*	-	*
15.中古次浊平声读入阴平	+	-	-	-	-
16.全浊上声大部分变去，少部分保 留在上声	+	-	-	*b	-

+表示具备该项特征，-表示不具备该项特征，*表示有部分字具备该项特征。

注释a本表所用粤方言和平话资料，主要参考以下文献：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麦耘：《粤方言的音韵特征——兼谈方言区分的一些问题》，《方言》2011年第4期；侯兴泉：《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谢建猷：《广西汉语方言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林亦：《广西的粤方言》，《钦州学院院报》2016年第6期；李连进：《平话音韵研究》。

b廉州话全浊上声74.3%归去，钦州话全浊上声56%读入阳平，32.1%读为上声，只有10.1%读入去声。参见黄倩《钦州市区白话与北海廉州话语音比较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6页。

根据表1,我们得出如下对比结果:在16项音韵特征中,汉越音与广府片粤方言共享的有5项,与勾漏片共享的有7项,与钦廉片共享的有4项,与桂南平话共享的有9项。

音韵特征对比结果显示,汉越音与桂南平话和勾漏片粤方言之间的相似性明显高于其他粤语次方言,其中与桂南平话的共享特征更多一些。我们参考粤方言的相关研究成果,侯兴泉全面比较了开建话与广州话、其他勾漏片粤语、桂南平话以及长安标话的语音一致性与差异性,认为开建话与其他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都同属粤方言,把勾漏片粤语与桂南平话归为粤语的一支,称为西部粤语。^①根据这一观点,汉越音与桂南平话和勾漏片粤方言之间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也就很好解释了。由此,我们可以说,汉越音系在音韵上呈现出与西部粤语相似的特征,它们可能来源于同一个古代汉语方言。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我们认为,韦树关提出的汉越音来自于古代岭南地区的一个权威汉语方言的论断应该是可信的。这个古代方言可能是今天粤方言(包括平话以及其他部分岭南地区方言)的前身。但这个古代方言的具体面貌,我们还需借助粤语方言史以及本地区相关汉语方言和其他民族语言历史更多的研究成果,才能得出更清晰的认识。

三、越南语汉源词汇与汉语南方方言在词汇和语法上的关联

除了语音特征,越南语汉源词在词汇和语法方面也呈现出受汉语南方方言影响的特点,但这种特征不像汉越音的语音对应那样系统。本文仅列出一些实例来显示其关联。

^① 侯兴泉:《粤语勾漏片封开开建话语音研究——兼与勾漏片粤语及桂南平话的比较》,第333页。

(一) 越南语汉源词汇中的汉语南方方言痕迹

在我们考察的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中，汉越音语素主要体现了与中古汉语在音系上的对应关系，由于汉字在古代越南长期被作为官方文字，汉越音本身也就具有“文读音”性质，汉越音语素在古代越南也主要用于书面语，因此汉越音语素大多数也是汉语通语词汇。汉语南方方言在越南语词汇中的影响，更多体现在近代以后的关系语素和借词中。在我们统计的单音节汉越语关系语素中，近代以后层次的关系语素有44个，包括10个汉越音语素，如：bá伯、đá打、hoạ画、thò驮、thuần盾；以及34个非汉越音语素，如：đĩa碟、giá芽、làn篮、mì麦、phà筏、sầm沉、sòng场、tá打（12个）、thầy睇、tủ橱、xíu少，等等。^①我们确定这些关系语素为近代以后借入，主要是依据汉语通语的历史音变，如中古入声字在近代以后入声韵尾的消失、咸深摄字-m尾转入-n尾等近代以后的语音特征。这一层次语素数量极少，声韵调对应没有形成系统性。有的对应可能是在近代以后的接触中经由口语途径借入，语音按照相似原则形成对应，而不是语音对应匹配。例如：giá芽（豆芽），sòng场（赌场），xíu少（一点点），其声母、韵母、声调都与粤方言今读高度接近，且不符合语音系统对应规律，极有可能是近代以后从粤方言中借入的。

扩大考察范围，我们在现代越语词典中还看到一批双音节或多音节的汉语方言来源词汇。例如：ca la thầu大头菜（“嘎拉头”），mì chính味精，xì dầu酱油（“豉油”），mã thầy荸荠（“马蹄”），mần thần云吞，sủi cảo水饺，màn thầu馒头，xíu mại烧麦，bò bía薄饼，等等。我们注意到，这些词汇多是饮食用词，语音上带有明显的粤方言或闽方言特征，甚至还有西南官话的特征。^②黄汇家在《越南语中的华南汉语方言借词》一文中列举了175个华南汉语方言借词，其中粤方言109个，

① 咸蔓雪：《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层次分析》，第565—567页。

② 范宏贵先生指出，ca la thầu（大头菜）借自云南话的“嘎拉头”。参见范宏贵、刘志强《越南语言文化探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4年，第252页。

闽方言24个，西南官话42个。粤方言数量最多，以饮食类和商业类词汇为主，闽方言多为饮食词汇和人称代词，西南官话多为地名。^①这些词汇与中古时期借入的汉越音以及汉越音所承载的汉越词不同，它们是按照语音相似的原则借入的，不仅没有形成语音对应规律，而且语音形式也并不固定。例如，“云吞”，越南民间既可以说mản thẩn，也可用vản thẩn；大头菜，可以说ca la thầu、cà la thầu或cà là thầu，几种读音形式在越南各地都可通行使用。越南语是拼音文字，词汇发音固定，抛开方言差异的因素，书写上是有标准形式的。而这些饮食类汉语借词在语音上的灵活性，正是由于口语途径借入的词汇并无标准字音造成的。这也体现了语言接触中口语借词借入过程的特点。

这些词汇还有一个特点，即词汇中的音节并不具有意义、不具备组成其他词语的能力，也就是没有成为语素，而必须是整个词整体使用。当然，个别词汇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简化，有的音节已经可以单独使用，单个音节可以代表整个词的意义。例如：lầu火锅，来自粤方言“打边炉”，越语口语中也有tả pin lù的说法，而字典收录的lầu，则是取了最后一个“炉”的对音，lầu已完全成为单音节自由语素。类似的还有“quẩy油条”，源自粤方言俗字“油炸鬼”，越南语也只取最后一字“鬼”的读音，按照语音近似读为quẩy。可见，按照语音近似原则借入的字音，随着词汇使用频率提升，按照缩略节省的原则被提取出来后，可以逐渐上升为语素甚至是词。

以上汉语方言来源词汇借用是在近代以后通过口语渠道借入的，没有形成系统性，更没有带来新的语音匹配，只是单纯的词汇借入。这是与中古时期系统借入的汉越音语素最大的区别。这类词汇的借入，也是汉越语言接触的结果。

（二）从语法上看汉语南方方言对越南语的影响

越南语与汉语类型学特征相近，都是孤立语，缺乏词的形态变化，

^① 黄汇家：《越南语中的华南汉语方言借词》，广西民族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2页。

以语序和虚词作为主要语法手段。除了修饰语后置这一特点外，其他方面大多呈现出与汉语相近的语法特点。但在具体的语法规则上，现代越语也呈现出与汉语不同的特征，有的方面体现出与汉语南方方言的相似性。一个典型实例是越南语辅助动词 *được* 的使用。*được* 在现代越语中的基本词义为“得到”，为非汉越音语素，通过声韵调对比，已确定与汉字“得”对应，归入中古前期（东汉末至隋唐前期）借入的关系语素。^①*được* 在越南语中可独立使用，也可与动词、形容词结合，表示能够、结果等。我们把越南语 *được* 与粤方言中的“得”进行对比，所见相近的语法功能如表2所示：

表2 越南语 *được* 与粤方言“得”对比一览表

语法功能	越南语 <i>được</i>	粤方言“得” ^②
独立使用，表示“可以”	- Được , chúng ta cứ thể mà làm. -Tôi có thể đứng đầu thiên hạ cũng được rồi.	得，我地就咁做。 我称霸天下都得啦。
放在动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叙述的对象或者状态对主语是如意的	-Hôm nay tôi được nghỉ. -Ngày mai tôi được về quê! -Nó chỉ mong cho mẹ nó được vui. -Anh ấy được bầu làm đại biểu.	今日我得休息。 明日我得返乡下啦！ 但只系希望佢妈咪得快乐。 佢得选做代表。
放在动词前，表示得到应允或许可	-Có vé thì được vào. -Không được nói láo!	有票就得入。 唔得乱讲话！
放动词后，表示能够完成某种动作	-Quả này ăn được . -Mấy hôm nay em bị cảm, có hát được không?	呢种果食得。 呢几日你感冒咗，仲唱得吗？
放动词后，表示达到对主语如意的结果	-Khai khẩn được rất nhiều đất hoang.	耕得好多荒地。

① 戚蔓雪：《汉语越南语关系语素历史层次分析》，第606页。

② 本表中所用粤方言句子，为越南语句子的粤语对译，由北京大学越南语专业2019级本科生李汶谕（籍贯为广东东莞，第一语言/方言为粤方言广府片）提供。

从以上对比可见，越南语中 được 的用法，在粤方言中大多都可以找到对应形式，显示越语 được 与粤方言“得”具有相似的语法功能。当然，这种相似性是由于二者都保留了古汉语语法特征，还是在长期的语言接触和交流中粤方言影响了越南语的汉源词汇 được，还需结合粤语史和越南语语法史作进一步的研究。我们考察越南语汉源词汇与汉语南方方言在语法上的关联，旨在判断在古代对越南语产生影响的汉语方言。虽然只能从一些零星的实例中进行观察，但这种较为整齐的语法对应无疑显示了汉语南方方言对越南语汉源词汇的影响。

四、从语言接触的结果看古代汉越语言文化交流

通过对汉越音和越南语汉源词汇与汉语南方方言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的一些特征比对，我们看到了汉语南方方言对越南语汉源词汇的影响。我们基本可以确定，汉越音来源于中古时期岭南地区的权威方言，但关于这个权威方言的面貌，还需要结合汉语方言史更多的研究成果。对于汉语南方方言对越南语汉源词汇乃至对整个越南语的影响，也还需结合汉语方言史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汉越音作为汉越语言接触最重要的成果，其时间起点可确定为中唐时期的汉语。而粤方言也是在晚唐五代才开始从通语中独立出来^①，亦即开始形成粤方言，时间起点与汉越音相近，两者都保留了中古汉语的语音特征，因此造成了粤方言和汉越音系的相似性。此后汉越音和粤方言进入不同的发展轨道，经历了上千年的演变，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所以二者也呈现出不同的语音特征。由于地理上的毗邻，粤方言（或其他汉语南方方言）对越南语继续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词汇层面有着最直接的体现。

^① 麦耘：《粤方言的音韵特征——兼谈方言区分的一些问题》，《方言》2011年第4期，第291页。

越南语汉源词汇所体现的汉语南方方言痕迹与不同历史时期华人南迁的史料记载相印证。汉越语关系语素从秦汉时期到近代以后的各个历史层次都有分布。汉越交流有信史可考者始于秦置岭南三郡（桂林、南海、象郡），之后是汉初赵佗立南越国统治岭南到今越南北部地区，再到汉武帝时设交趾三郡（交趾、九真、日南）辖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东汉锡光、任延出任交趾、九真太守教化民众，直至东汉末年士燮治理交趾四十年，开设学校，传播汉字和汉文化，开交州风气之先，被称为“南交学祖”，史籍中留下了大量中原徙民、士人南迁等中原汉民与岭南和交趾之地民众杂居的记载。^①从西汉时期的“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到士燮时期“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可以看出交趾地区逐步接受汉字和汉文化的过程。

秦汉至隋唐前期，汉语方言也处于早期形成过程中。韦树关认为，今岭南一带形成汉语方言，应该是西汉之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平定南越，设九郡，其后于公元前106年设交趾刺史部，总领九郡，治所在苍梧郡广信县（今梧州），直至公元217年孙权将岭南的政治中心从苍梧广信迁至南海番禺（今广州），广信作为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三百余年，对广西和广东交界一带的汉语方言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一带汉语方言的最终形成时间至迟不晚于隋唐，由此提出当时岭南地区的权威方言应为“广信方言”。^②值得一提的是，士燮就是

①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汉书·高帝纪下》：“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凡交阯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阯，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三国志·士燮传》：“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殊域周咨录·安南》：“时有刺史名仕变（士燮），乃初开学，教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相关史料记载较多，不一一摘录。

② 韦树关：《汉越语关系词声母系统研究》，第195—196页。

苍梧广信人。我们还无法确定当时这一地区权威方言形成的时间和面貌，但是，从汉越语关系语素的早期层次（上古、中古前期层次），以及壮语汉借词中的前中古层次^①来看，壮族和京族的先民们的确接受了同一种汉语方音。逐步形成中的汉语方言进入了原始的其他民族语言中，对民族语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在今天的民族语言中留下了痕迹。

汉越语关系语素中的上古（时间下限到东汉时期）和中古前期层次（东汉末年至隋唐前期）两个层次就是这一时期汉越语言接触的结果。由于当时的教育制度并不完善，是在“教取中华经传”的过程中“翻译音义”，语言学习是以教化民众为目的，当时还没有官方韵书，汉语的学习是在一种自然交流状态下习得的，不一定形成完整的字音系统。另一方面，官方汉语教学是以教习经传为目的，肯定偏向于书面语，因此应该有不少书面语词汇进入当时的越南语（或其早期祖语），此后逐渐有一些跟日常生活相关的高频汉语词汇在口语交流中被借入。在汉越语关系语素的早期层次中，我们看到一些词集，如属于中古前期层次的天干地支词汇：tý子，dàn寅，thìn辰，ngọ午，mùi未，dậu酉，bính丙，quý癸；颜色词，如vàng（黄色），tía（紫色），biéc（碧绿），等等。这些词汇较早进入了越南语，显示汉语、汉文化在东汉末至隋唐前期在古代交趾—交州地区的影响之深。

汉语汉文化对古代越南地区影响的高峰是唐中晚期，这与汉越语关系语素的主体层次——中古晚期层次相对应。从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汉文化发展和传播的重要时期。公元679年，唐朝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从此交州始称安南。唐朝在安南地区实行了有效的管辖和统治，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建立起完备的制度，文教制度和人才选拔政策与其他地方并

^① 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第91页。

无二致。可以想见，当时的安南地区接受汉语的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相同，只是接触到的方言不同而已。科举制度在安南的推行促进了汉语、汉文化在当地的传播，一大批当地士人参加科举并入朝为官，爱州日南人姜公辅（730—805年）应举中进士，在德宗朝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就是突出的例子。这显示了当地接受汉语和汉文教育的程度，说明当时安南的文教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差距不大。由于文化上的密切交流，大量的汉语词汇及其所携带的字音进入越南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汉越音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形成。来源于汉语书面语的汉越音语素，至今仍是构成越南语汉越词和越南语词汇的重要元素。

公元10世纪之后的越南继续受到汉语、汉字和汉文化的影响，无论是直接使用汉字作为官方文字和书面语，还是官方和民间存在的密切的人员交往，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一直存在，汉越语言接触持续进行。以词汇影响为例，那些明显来源于汉语南方方言的词汇，显然是随着中国南方移民到达越南，通过口语途径进入越南语的。由于历史上的密切交往，历代都有汉人通过各种渠道移居越南，在公元10世纪后，较大的汉人移民潮发生在宋末、明属时期（1407—1427年）、明末、19世纪末等时期。其中，尤以明末时期明朝遗臣遗民开发湄公河三角洲的史迹影响较大，直至19世纪初阮朝正式认可“明乡人”的存在，这些明朝遗民后人成为后来越南南方华人主要的来源之一。此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大批华人下南洋，又有新的华人移民在越南各地定居，逐渐形成今天的越南华人。正是在这样一代代华人移民越南的过程中，一批批新的汉语南方方言词汇也进入越南语，从我们在越语词典中搜集的例词来看，绝大部分是饮食方面词汇，足可见近代华人融入越南社会过程中，饮食文化最容易被越南人所接受。虽然10世纪后的汉越语言接触不如中古时期系统，但我们依旧能看出这种影响的痕迹。语言接触的结果反映了族群迁徙和不同语言社团、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

结 语

汉语和越南语经历了长期的语言接触，不同时期借入的汉源词汇共存于现代越南语中。越南语汉源词汇与汉语南方方言，尤其是粤方言存在关联，汉越音系在音韵上呈现出与西部粤语方言相近的特征，越南语汉源词汇在词汇和语法上的特点也显示出与汉语南方方言的联系。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越南语汉越音以及汉源词汇受到了汉语南方方言的影响，其中以粤方言的影响更为突出。语言接触的结果与历史上的人员往来、族群迁徙及社会文化交流的过程相印证。越南语汉源词汇在不同历史层次的分布体现了汉语和汉文化进入越南的过程，越南语汉源词汇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关联也是历史上岭南地区与交州—安南地区密切交往的结果。对于粤方言以及汉语南方方言如何影响了越南语，我们期待依靠有关粤语史、汉语方言史、越南语史以及中国地方志和越南历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讨。